

分析性叙述：为复杂的历史进程建模

玛格丽特·列维

陈涛译*

分析性叙述研究计划表达了一种使已经被许多学者所采用的，即把历史的比较研究和理性选择模型结合起来的研究进路更加清晰、更加明确的努力。为了理解制度起源与变迁的实际情况，分析性叙述坚持把对具体案例的深刻把握与精确理论模型相结合。然而，这些条件还不足以使分析性叙述与其他娴熟的比较历史研究相区别。这篇文章的核心在于阐释“是什么构成了分析性叙述研究进路”，以及“它与其他进行严格比较历史研究的研究进路有什么区别”两大问题。尽管在原书以及对批评的回应中(Bates, *et al.*, 1998, 2000a, 2000b)作者们已经努力阐述了这一研究进路的关键元素，但是更为系统化的阐述仍是必要的。

一、研究背景

《分析性叙述》这本书汇集了承诺对制度变迁进行解释的五位学者的文章。受诺斯的影响(North, 1981, 1990, 1996)，这本书中的论文都旨在使用新制度经济学(the New Economic Institutionalism)分析工具来探讨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如政治秩序、经济和政治的治理问题以及(美国国内)州与州之间的关系。然而，这本书中大部分文章都是对诺斯“制度，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都是通过约束和激励来影响行为的规则”这一定义的扩展。

制度在这本书中被重点强调为协调行为的自我实施均衡。这一观点来自于博弈理论，特别是与其中的扩展式博弈和子博弈精炼有关。选择被规律化、稳定化和模式化——制度化，如果你愿意这样称呼的话——因为它们是在均衡状态下作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是诱致性的而不是强制性的。然而，参与者讨价还价能力以及资源的分配变化将决定在许多可能的制度均衡中哪个会真的呈现(Levi, 1990; Knight, 1992)。分析性叙述研究计划非常重要

* 玛格丽特·列维(Margaret Levi)，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政治学教授，2004—2005年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陈涛，沈阳化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通信地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11号街，110142；电话：13889123971；E-mail：chentao622@sina.com。译者感谢辽宁大学韩毅教授、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张长东博士对翻译中遇到的一些问题给予有价值的指正，感谢Margaret Levi教授和德国Campus Verlag出版公司对中文翻译的授权，感谢沈阳化工学院博士科研基金的大力资助。本文原文来源：Margaret Levi，“Modeling Complex Historical Processes with Analytic Narratives”，in Renate Mayntz (ed.)，*Akteure, Mechanismen, Modelle: Zur Theoriefähigkeit makro-sozialer Analysen*，108—127。

甚至核心的问题是多重均衡的可能性。这一研究进路被认为有助于理解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均衡解的选择、维持和转移。

把制度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变迁看做多重均衡问题是对这类学术努力强加某种边界的做法。尽管诺斯的纲领性著作可能思考的是西方世界的整个历史,但是他的研究倾向于考虑更为具体的问题,例如,英国光荣革命后君主立宪制的起源(North and Weingast, 1989)。《分析性叙述》中的文章也都同样关注在特定时间和地点产生的具体制度。

需要澄清的是,这些文章并非什么方法上的重大突破。事实上,许多比较研究学者都在做类似的工作,例如弗雷兹·夏普夫(Sharpf, 1991, 1997)、戴维·莱丁(Laitin, 1998),以及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如罗格·彼得森(Petersen, 2001)和陶本·艾弗森(Torben Iversen, 1999)。《分析性叙述》中的文章其卓越之处不在于研究本身,而在于其资料的展开都是为了强调构造一个分析性叙述的步骤。作者们在回应乔·艾尔斯特(Jon Elster, 2000)的评论时称,“……通过尽量系统化,我们开始要求自己和其他人展示分析性叙述的规则,并且弄清楚这样的研究进路会如何增进我们对问题的理解。”(Bates *et al.*, 2000b, 第696页)

激发了这一研究进路,并使它看起来值得去做的是与这些作者研究风格有关的两个因素。

第一个动机是重新认识尽管属于理性选择阵营,但是有人在研究和写作的实践中仅使用演绎方法。其他从事类似比较历史研究工作的学者也另有理由持此观点。这些理由待我们讨论过分析性叙述研究进路的细节后将会谈及。

第二个动机更多地与目前比较研究应该怎样发展的探讨有关。目前正是旧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失去其主导地位的时期,至少在美国大学的社会科学系里是如此。学者们正试图把他们的研究放在更广阔的理论 and 比较视野中。理性选择已经影响立宪政治学很长时期了,特别是在相对稳定的民主制下的立宪政治研究。而它也是依靠新古典经济学工具的经济史研究的基础。理性选择模型对于理解叛乱、革命、国家转型和其他重要的比较历史过程的有效性仍有较多争议。但是,分析性叙述研究计划的部分目的是宣扬这种研究进路对于理解广泛的重要事件和结果的有效性。

因为想要将分析性叙述研究进路系统地呈现出来,这些文章的写作都试图揭示作者们的推理框架和建立模型时的决定,以及作者们如何从宏大历史中挑选根本要素,如何设计他们的解释。这使得文章的写作显得教育味道略浓于文学味道。毕竟在这些文章中理论的质量和能否得到证实是该研究计划赖以存在的基础。

《分析性叙述》中的各个独立章节探讨在广泛的时间和空间领域里的制度变迁问题。它们都集中研究某一个历史疑点,有的是只发生在一个国家的。其首要目的是理解某一套制度,但是这些研究和发现加总在一起就有了更为

广泛的含义。

阿夫纳·格瑞夫的那一章 (Greif, 1998) 讨论了12世纪的热那亚。他探讨了 *podestà* 制度¹ 的起源。*podestà* 是指一个没有军事力量作后盾的统治者。作为一项制度, *podestà* 解决了当时热那亚的家族冲突并推动了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简·劳伦特·罗森塔尔 (Rosenthal, 1998) 将读者带到了17—18世纪的法兰西和英格兰。他比较了两国统治者筹措战争经费的能力, 并认为财政权利的不同是一个长期的主要解释变量, 并且也是两国不同的制度变迁轨迹的重要解释变量。玛格丽特·列维 (Levi, 1998) 转向19世纪。她调查了当时法兰西、美国和普鲁士政府政策变化以及市民对征兵的反应, 并研究这一切变化背后的制度基础是什么。特别是她解释了允许以赎买的方式逃避服役的做法的消失。巴里·温格斯特 (Weingast, 1998) 也阐释了一项19世纪的制度。他关注的重点是平衡规则, 即对允许实行奴隶制各州的妥协, 以及它是如何改善美国南北战争前政治稳定的。这篇文章的突破之处在于认为奴隶制是战争爆发原因的传统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尽管罗伯特·贝茨 (Bates, 1998) 阐述的是一系列咖啡生产国, 其他他感兴趣的仍是一个具体的制度, 即国际咖啡协议。他解释了这一制度是如何兴起又是如何衰落的, 为什么美国作为咖啡的主要消费国愿意在二战以及冷战期间与卡特尔合作一起稳定咖啡价格。

在解释历史上某一有趣时刻的令人着迷的制度时, 格瑞夫将派系斗争与政治秩序的关系理论化, 从而构建了自己的讨论体系。罗森塔尔探讨的是体制变迁的根源, 还有国家政治结构与发生战争的关系。列维关于民主化导致公正规范的改变影响制度变迁的时机和内容的发现, 暗示了对规范的考虑的重要以及合法性是民众服从政府和其他更一般意义上的管制机构的制度基础。温格斯特发展了一个理解联邦主义的制度基础和影响的范式。贝茨对理解在国际市场上组织的政治基础胜过经济竞争的情况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分析性叙述研究进路

分析, 在这个研究进路里是指建立理性选择模型, 特别是扩展式博弈理论模型。首先, 这意味着要从叙述中提取关键参与者以及他们的目标、偏好和影响参与者行为的有效规则。其次, 它意味着详细刻画那些产生限制某些行为而方便另一些行为的均衡的策略互动。分析性叙述的研究重点是要弄清某一时点上的制度均衡向另一时点上的制度均衡“漂移”的原因是什么。

分析性叙述的模型必须既能产生受到支持的解释, 也能产生其他可替代的假说。首先, 建立清晰而明确的假设, 然后挑战这些假设将可能得出新的

¹ 译者注:热那亚的 *podestà* 制度(即雇佣执政官制度)是以一个非热那亚人担任的雇佣执政官为核心, 他受城市雇佣担任军队的领袖、法官、执政官, 并得到了追随他的士兵和法官的支持。(韩毅, 2007)

洞见和对资料的挑战性的解释。其次,模型应能刻画比较静态结果。比较静态学对比较研究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们是关于在不同条件下还会发生什么的假说的基础。比较静态学阐明了关键外生变量。当模型为博弈理论模型时,它们还能提供假说建立的另一个来源。对“非均衡路径行为”的考虑将会揭示关于为什么行为人选择一条路而不是另一条路的原因和推理。事实上,行为人关于他们如果另作选择将发生什么的信念可能决定了他们作出什么选择。

分析性叙述中的叙述构建了活生生的主要行为人,以及他们的目标和偏好,此外还阐明了博弈有效规则、约束和激励。叙述就是一个被谈论的故事,这个故事要把整个背景和过程刻画得详细而条理清晰,并且连续性(sequence)和即时性(temporality)都要照顾到。它不是后现代意义上的“主叙述”或者是“超叙述”。它是指根植于传统的历史方法的研究。但是叙述要比传统方法提供的帮助更多。正如詹姆斯·曼哈尼(Mahoney, 1999, 第1164页)所总结的“一种共识正在形成……,它是评价在考虑进时间连续性、特殊事件和路径依赖的情况下的因果关系的一个有用工具”。

叙述可以提供对观察到的同类事例,也就是说,能导致同一结果的两种不同过程的多种可能解释。如《分析性叙述》附录中博弈的例子所示,在均衡状态下,敌人不会去攻打一座拥有强大军队的城市。当没有受到攻击时,拥有强大的军队的理由是为了和平吗?或者它是一种资源浪费呢?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信念,其他人只有在弄清楚来龙去脉的情况下才能够理解:

……观察到的同类事例的解释明显依赖不同的行为理论。为了检验一种解释,我们必须从博弈中走出来,去作经验资料的调查。我们必须确定对手的信念是怎样影响他们的行为的。这种战略推理与经验调查的结合有助于使分析性叙述方法更加精确。……(Bates *et al.*, 1998, 第241页)

有时候,光靠叙述不足以对两种可替代解释进行评判。而理论则可以将断定哪些是正确的必要条件具体化。格瑞夫对1164年前热那亚政治秩序的分析正是为了说明这一点(Greif, 1998, 第35—36页)。叙述成为了为因果机制提供支撑的关键,也是那些喜欢解释是可检验的社会科学家们关心的重点。虽然这有时导致这些分析性叙述研究计划的作者们讲故事的方式无法符合许多历史制度主义者的审美标准(Carpenter, 2000, 第656—657页),但是它仍然是一种叙述。

分析性叙述首要的是挑选一个问题或者困惑,然后建一个模型去详细阐明解释的逻辑、关键的决策点和可能性,最后通过比较静态学和由模型产生的可检验推论来评价模型。²作为一个研究进路,分析性叙述对于那些想评估

² 在《分析性叙述》中,作者们使用“理论检验”这个词。然而,正如凯文·金(Kevin Quinn)所指出的,在大多数的分析性叙述中所观察到的事例数目很少,因此,能否检验还是个问题。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过于简化因果机制 (parsimonious causal mechanisms) 的力量的学者最有吸引力。清晰的正规理论化的要求 (或者理论即使现在不是, 至少还有被正规化的可能) 迫使学者们去阐述因果关系, 并且搞清楚少量的变量。

这一研究进路为研究者提供某种准则。这里宣扬的明确的理论为使研究者能够提炼叙述并且确保解释不必太依靠模型外部的因素提供了标准。

(一) 案例选择的标准

在比较的、历史的社会科学里, 有一些非常不同的案例选择战略。一种是根据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教义, 选取最相似或者最不同的案例, 然后用案例去揭示关键的解释变量。那些标榜自己为历史的社会学家、历史的制度主义者, 或者宏观比较学家的学者已经在积极地改造、发展这一研究进路 (Skocpol and Somers, 1980; Mahoney, 1999)。另一种战略是要发展一种强调“聚焦”和“构造类比物”以及“过程追溯”的比较方法 (George, 1989; George and Bennett, forthcoming)。对这方面讨论作出重要贡献的一项近期成果 (King *et al.*, 1994) 包括了对因果推理的科学程序的强调, 以及有可能从另外的描述材料中推导出解释的一般可行标准。金、凯欧翰和沃尔拔 (King, Keohane and Verba, 1994) 强调将统计原理应用于案例选取上。然而, 第四种战略坚持认为要从一个一般理论出发, 然后去发现真正验证这一理论各个方面的案例 (Kiser and Hechter, 1991)。最后, 有这样一些学者, 他们是这一世界的某一方面的专家, 并在这个领域内探索各种具体问题。

分析性叙述的作者们与第四类学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信赖理性选择, 与最后一类学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通常会对某一类特殊案例深感兴趣。这种结合使他们有一个大多数某领域专家所缺少的目标: 超越案例的细节描述, 而去刻画制度变迁的更一般条件。这意味着一定有不同于解答疑问似的选择案例的标准。案例选择的标准方法强调, 主要选择那些体现利益因果链条的案例和那些能说明关键变量缺失、出现或极有价值的案例 (Van Evera, 1997, 第49—88页)。尽管这些可能是选择案例去检验或者产生一个一般理论的严格标准, 但是分析性叙述研究者所使用的这些标准更接近于历史学家的标准而非一般社会科学家的标准。

分析性叙述的标准还包括使案例具有适合模型化处理的特征, 并不是所有的困惑或者难题都是如此。换句话说, 它们必须提供一种使用其他方法不容易获得的重要程序或者机制。最后, 因果机制和结构或者关系必须可以一般化于其他特殊条件下的案例。

1. 策略选择情境

建立模型的关键在于对存在关键参与者策略互动的案例的选择。也就是说, 一位参与者的选择依赖于另一位的选择。另外, 通过考虑能够被模型化为扩展式博弈并且存在子博弈精炼均衡的情境, 制度的自我实施转化成可置

信承诺问题。在均衡状态下,参与者履行他们的威胁或者承诺而去惩罚那些偏离均衡路径的人是符合自身利益的。

这不意味着博弈(及其激励)不能改变。正如已经提到的,比较静态结果意味着它可能在哪里。事实上,对于改变的根源的理解是理解制度变迁的关键。然而,理解制度稳定性的原因也是重要的。因而,温格斯特关于平衡法则的分析解释了在奴隶制存续问题上具有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是如何从对奴隶制的妥协中获利的,为什么他们又停止了获利,为什么制度发生了改变以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机制。

2. 偶然性

多重均衡的存在使得偶然性成为分析性叙述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特征。偶然性为战略这一研究进路的另一个基本要素提供空间。如果起点是偶然的,那么产生的均衡就明显受偶然性的支配。无论起点在哪,到达一个或者另一个均衡都是偶然的。

然而,即使有清晰的聚点和策略,一种情境下的种种因素还是可能发生出乎意料的变动。一些背景变化(contextual changes)可能有清晰而深远的影响,还有一些变化可能有蝴蝶效应,也有的可能只产生很小的影响或者没有影响。叙述在这里对于分清楚“什么对什么起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在罗森塔尔的章节,詹姆斯二世的即将问世的天主教继承人影响着君主和贵族的利益计算,但是它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如何改变贵族的战略直至到达革命临界点的(Rosenthal, 1998, 第92页)。经过叙述,为什么他们不得不诉诸于革命而不是和平制度变迁变得清楚了。

不确定性和信息缺乏是对历史事件进行解释过程中的普遍特征,也是偶然性的主要来源。它们发挥作用的一个例证是它们在列维关于工会领导权的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她发现,工会成员们非常希望有称职的代表,能够很好地代表他们谈判或者组织罢工。他们会尽最大努力根据潜在候选人以往作为组织者、罢工领导者、地方领袖和事务代理人的记录弄清楚谁是好的领导者。然而,工会成员无法确定资方将如何反应,经济将会怎样,以及领导者在不同形势和环境能取得怎样的斗争效果。一些行为同样是可能的,包括高压手段和贪污这些伴随领导权而生的行为;普通成员好像选择了当时最好的领导权,无论它以哪种形式出现。这样就有了对组织的其他方面的影响,例如它的治理安排以及商业与社会的联合主义的发展倾向。如果工会成员们完全知道并且理解他们最初的选择意味着什么,也许他们会作出不同的选择——如果他们能那样做的话。然而正是不确定性这一因素导致他们维持着既定的领导和领导权的模式,而且他们会继续让那个人在位几年。

这些案例一定涵盖了一些随机或者是偶然的难题,但是它们绝不是极个别的。工会组织的例子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工会成员面对关于罢工的不确定性和资方对他们要求的反应的信息不完全性,解决了他们的领导权难题。

因为工会和管理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不可预见的，并且工会领导人无法总是履行他们的承诺，所以有了领导权的定期轮换。但是，如果那是真的，工会领导权将不是一个好的分析性叙述的研究主题。可能独立地处理每一次选举并用数量方法去发展和检验领导权选择和保持，或者集中为工会和工人团体的文化提供一种解释会更好。

在《分析性叙述》中所阐明的这一研究进路适用于分析那些在历史路径上既有一定的偶然性又绝非绝对偶然的案例，以及那些由模型能够帮助理解什么可能发生的案例。除了限制它去解释确定性的和低偶然性的案例以外，对于它没有其他需要限制的。扩展式博弈已经被证明在研究高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的问题上具有良好效果。

（二）建模

分析性叙述青睐于那些包含尽量少的外生变量的简单模型。由于变量少，所以可以知道模型中变量数值的变化是怎样影响制度均衡发生改变的。它也会降低其他因素对故事的重要性，从而影响叙述。例如，对于贝茨来说有一类偶然性是重要的，即咖啡价格的变动。咖啡价格变动对世界经济来说可能是重要的，但是对于美国经济变化来说却差得多了。所有的叙述必须有一个理论支撑（anchor）（或者一系列理论支撑）。分析性叙述比其他更形象化的描述所提供的理论支撑更清楚（因而也更容易受到批评）。

在建立模型时，尽量避免使用框架模型（shelf models）是明智的，除非它们确实有助于解释问题。经验社会科学家们经常求助于一小撮模型中的某一个（囚徒困境、性别战、道德风险的委托代理、逆向选择的委托代理），即使这些模型仅仅是使用稍微不同的术语重新描述了实际情境，或者是仅阐明了所调查问题的一小部分。它们的分析依赖事件发生前后的背景。这里的每一个模型带来的可能是一个有效解，也可能是一个无效解；可能是一个已解决的问题，也可能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应用哪个模型取决于对背景知识的掌握程度。一旦背景知识掌握得很充分，研究者就能够建立一个既可更好地适应特定案例，又能捕捉到实际的制度约束的模型。制度约束阐明一系列可能的结果之所以可能，它们还暗示一个社会所面临的某一特殊难题如何能得到解决。

分析性叙述的模型应该建立路径依赖。它所要求的不仅仅是识别那些源自过去行为的约束或者是被建构在新制度中的激励。历史事件所发生的顺序很重要；遥远的过去事件能够产生某种特殊的、至今仍有影响的因果链条。一篇有关关键链接³（critical junctures）的文献已经试图系统地探讨这种先后

³ 这是一个关于关键链接文献的极好的评论，见 Kathleen Thelen (1999)。

顺序,但它是以一种与分析性叙述迥异的方式展开的。博弈论,特别是子博弈完美性——一种对非均衡路径行为的分析,为准确理解为什么特殊的起始点会影响后来历史顺序中的情况提供了解释基础。

路径依赖,当它像棱镜分析一样对那些没有被采纳的路径展开分析时,其含义不仅仅是“历史重要”。这的确是事实。再次强调,正是多重均衡的存在使路径依赖既有趣又重要。一旦将确切的支付整合进来,博弈的起始点就影响(经常是决定了)终点。特定的背景下某种制度是自我实施的,这意味着其他的选择持续不受欢迎。参与者的信念和历史一样重要。而信念显然会受到历史经验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行为人对其他在当前背景下的参与者行为的认识的影响。

分析性叙述中的路径依赖也暗示一旦特定的制度安排(以及由此形成的权力和威信的特定分配)已确立,要想彻底扭转或改变它的进程就更加困难。罗森塔尔通过考察法国和英国17世纪政治制度的分野非常清晰地阐述了这一观点。这些是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 2000)在他的有影响的论文中所强调的内容(又见Thelen, 1999, 第392—396页)的反馈效果吗?这还不太清楚。分析性叙述研究进路同样具有这些系统阐述的某些特征,但是其差异和相似的程度仍需全面探索。一个明显的分歧在于理性选择的文献重点强调行为人关于他们的行为将产生什么影响的信念,而历史制度主义者的研究进路则倾向于强调制度产生的决定性影响。

格瑞夫关于商业革命的研究(Greif, 1996)是个例子。格瑞夫区分了预期的多种形式,这些预期协调行为,有时还会导致那些将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的组织的产生。这些预期是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以及科技这些社会特征的综合作用下产生的。一个协调点(coordination point)自身的存在就使改变变得困难,因为它使得定位(locate)以及接下来令其他人转移到另一个协调点需要付出足够大的努力才行(Hardin, 1999)。当组织发展起来时,路径将被建得更加牢固,因为组织倾向于维持它的既得利益。它将坚持既定路径,即使这条路径已经不再是最优的。

(三) 演绎、归纳和重述(iteration)

在分析性叙述中,叙述和分析是完全缠绕在一起的。这一研究进路并非从一个一般模型出发推导假说,然后再用适当的案例去验证它的演绎推理方法。这是一个理性选择学者普遍的做法,也是一个已经产生一些非常重要的洞见和发现的做法(Levi, 1988; Kiser, 1994; Golden, 1997)。然而,对于分析性叙述来说,用来阐明变量间因果联系的模型是重述的和归纳的,尽管初始制度可能是演绎的。理性选择的假设和博弈论的逻辑产生假说,而模型则需要在与叙述所表达的细节的互相影响下得到完善。当假说是由一般理论演绎得来的时候,你将发现一般化的要求更加显而易见,而对详细情况的解释

可能就不那么吸引人和现实了。这是长期以来来自比较历史政治学中理性选择学派的批评意见，也是分析性叙述研究计划试图解决的问题。

《分析性叙述》的所有作者都依靠理性选择来产生假说和提供理论支撑，并且他们每个人都有从事历史研究、实地调查或者两者兼备的训练和经历。这类研究开始于一些基本信息和一些理论假说，但是下一步将是积累新信息、构造新模型。贝茨那一章展示了这一过程，即由一个寡占模型到一个政治经济模型的转变。他从一个已清晰表达的优势点（vantage point）出发，让证据与之对抗，然后再选择一个新的优势点。

在理论和数据之间的重述也有对研究行为的启示。每一个被采用的新模型应该与掌握的事实相一致，并且显示出什么样的新数据仍需要进一步查找。在构建理论的时候，社会科学家们经常已经对他们研究的数据、问题、案例了解很多了。这是社会科学的普遍规律，在像分析性叙述这样要求理论必须被嵌入到叙述中去的研究进路里更是显而易见的。

三、评价

对于评价分析性叙述研究进路的执行情况有多种标准。在这些标准中有几个是逻辑方面的，其他还包括证实和一般化（generalizability）。这些标准中大多数都在训练有素的社会科学家的标准工具箱中，它们实际上被用于对所有研究的评价。詹姆斯·曼哈尼（Mahoney, 2000, 第86页）宣称：“那些新理性选择理论的鼓吹者仍没有完全说清楚他们检验假说的方法。”下面的内容仅是一种矫正的最谦卑的开始。

（一）逻辑

分析性叙述的长处之一在于可以根据严格的、经常是正式的逻辑来评判一场争论。结论必须跟随前提。如果推理是错的，或者不够准确，那么阐述的理由就因此失去可信性。逻辑一致性既规范了因果链条，也规范了叙述。清楚的形式化和数学推理的采用是尤其需要的。数学的使用意味着要么对要么错，二者必居其一。

然而，正确的数学很难说是评价的唯一标准。一个给定的叙述表明一个模型在解释问题时应当能显示行为人的选择、行为和他们之间的策略互动。那些显示的内容又迫使学者重新考虑之前的叙述，然后重新评估叙述的关键要素超出原来所提理论的程度。如果必须过于频繁地诉诸于模型外的力量，那么该理论必须被拒绝。同时，模型将分清楚哪些问题是不能通过逻辑解决，只能通过叙述资料得到解释的。

(二) 证实

有不少方法可以用来评估那些作者提供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被数据证实且优于其他的解释。不只是假设和因果机制必须与事实相符,模型还必须能产生可检验的、其他模型无法提供的暗示。

要求有明确的假设对评估过程有帮助。然而,它也使分析者多了证明假设合理性的负担。判定为关键行为者的参与者确实是关键行为者吗?作者们已经提供了关于行为人的偏好、信仰和目标的内容和次序的可接受、可防御的定义了吗?对简化假设的依赖容易激起来自那些重视时间和地点的历史背景的学者的挑战,同时也会激起来自那些并不试图发现假设的逻辑性或者是它与叙述所呈现的资料是否一致的学者们的挑战。逻辑是嵌入在分析性叙述里的,而经验资料往往一方面去创造,另一方面去评价,很快又相互纠缠在一起。二者必须高度融合。

与产生假说和暗示的其他方法一样,从模型中产生可检验的暗示然后使之隶属于证伪是对分析性叙述评估的关键。然而,分析性叙述的重述特征(iterative feature)增加了另一个评价的维度。正如《分析性叙述》一书的作者们指出的,

“当我们用完可检验暗示时,我们就不再重复。我们方法的一个暗示就是在最后的重复里我们仍保留着不确定的态度。具有讽刺性的是,也许我们更加肯定何时理论失败而不是何时它们与案例资料相符。”(Bates *et al.*, 1998, 第17页)

分析性叙述和过程追踪(George and Bennett, forthcoming)都承诺一旦数据揭示了新的可能性就对模型和解释进行修改。然而,存在一点不同。分析性叙述运用清楚的理性选择模型,特别是依赖扩展式博弈,对过程有一个更清晰、更严格的刻画。过程追踪和分析性叙述如果处理不当都容易堕落为曲线迎合练习(curve fitting exercises)。分析性叙述最伟大的力量之一可能就是博弈论与重述的结合推动研究者去寻找那些旧模型从未意识到和捕捉到的新颖因素。这使得模型的完善成为拉卡托斯意义上的进步研究纲领的一部分。⁴

充分证实的最后一个标准是,这一理论所提供的解释比其他可接受的解释强到什么程度。有时候,作者会在争论或总结中产生新的解释。温格斯特和列维研究的问题就是这样。有时候,新的解释来自于一个一般框架。例如,格瑞夫论证了他的政治经济理论优于一个文化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比较静态结果会提供某些相互竞争的解。然而,通常一个替代的解的产生一定

⁴ 是 Turan Kayaolu 提醒我注意这一点的。

是来自于学术争论的另一方，而不是来自分析性叙述的作者。无论作者们如何试图保持客观性，他们往往忠于自己的解释和他们自己组织叙述的方法。因而，只有当持不同观点的不同学者都试图对同一现象给出更有力的解释时，社会科学才会真正进步。

（三）一般化

分析性叙述的“阿基里斯之踵”在其实现一般化（generalizability）的能力上。毕竟它代表一种对在特殊地点和时间产生的特殊困惑给予解释的努力，所使用的也是为特定情境量身定做的模型和理论。即使如此，通过运用这些事例来产生某种更一般的观点是有可能的。

尽管这种研究方法并不是直接演绎的，但是它依赖于理性选择——这个阐释结构如何影响个人选择从而会影响集体结果的一般理论。这与凯瑟和赫切尔（Kiser and Hechter, 1991, 1998）的观点不太一样。他们是严格演绎的。这种不同不但主要在对演绎和归纳相对角色定位上存在，而且在发现的方便程度上同样也存在。他们还没有发现博弈论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有用性（Hechter, 1990, 1992）。

分析性叙述研究者们发现了博弈论在构造模型、评价解释和一般化这些方面的重要价值。对于他们来说，理性选择，特别是在它的博弈论形式下，能够凸现结构的某些重要特性以及从中产生的策略选择。“……即使某一特殊博弈可能使用起来不方便……它们仍然可以产生出在不同的参数设计下可检验的解释”（Bates *et al.*, 1998, 第234页）。通过识别集体行动难题、委托—代理问题、可置信承诺、否决点（veto points）以及诸如此类问题的各种特殊形式，分析性叙述提供一种显示哪些方式以及以何种方式应用于情境特征的方法。例如，最初由威廉·瑞克（Riker, 1964）提出，后经温格斯特和他的合作者们发展的联邦主义模型（Weingast, 1995; Weingast *et al.*, 1995）对广义上国家的大量问题的说明很有用，其中包括温格斯特在《分析性叙述》中他的章节里所阐述的事例。

进一步的，分析性叙述研究进路还需要识别因果机制。它不仅仅包括机制指令表（the repertoire of mechanisms），例如，情感、怨恨，以及诸如此类对行为与其他选择之间联系提供细致入微的解释的因素（Elster, 1998, 1999）。机制指令表观点似乎强化了Elster承认的那种对于“统一理论”和解释规律（law-like explanations）的可能性的怀疑主义，一种“接近于解释上虚无主义”的怀疑主义只有通过“一种机制的想法能提供一种有解释力量的办法”的重新认识来弥补（1999, 第2页）。另一方面，阿瑟·斯汀考姆（Arthur Stinchcombe）争辩道：“一般来讲，有关机制的理论除非它们在总体或结构层面上产生新的预期，否则是没有用的。”（Stinchcombe, 1991）分析性叙述研究者们发现，他们自己在这场辩论中是站在斯汀考姆一边的，并且

就是试图证明这样一个因果机制。

罗格·彼得森 (Roger Petersen) 提供了一个用博弈分析方法来连接机制与结构的概述。他强调过程, 并用它来指代机制的顺序和联系。如他所述,

当结构能够被预先确定时, 即它独立于结果, 预测才成为可能。其次, 决策结构可以将个人行为与总体现象联系起来。通过对不同分析层次之间的因果链接的界定, 博弈论能够提供来自现有的宏观理论的微观预测。(Petersen, 1999, 第 66 页)

为了进一步建立起理论的一般性, 例外的检验 (out-of-sample test) 是必需的。今天的社会科学研究假设作者们将自己提供那些检验, 很多人的确试图那样做, 包括列维和罗森塔尔在书中也是这样。然而, 对所举例子以外的事件的认识水平很少能够与那些曾经困扰作者, 并已经被详细理解的最初案例相匹敌。虽然作者被认为应该在广泛的事例上有同样的发言权, 这是作者负有的义务, 但是这对于某一领域的专家、历史学家以及其他学者来说是很难实现的。他们必须克服语言、史料的约束, 并获得对某一重要题目或为某一分析性叙述提供关键细节的叙述的深度权威。因而, 再次强调, 一般化的证明可能要依靠有更多的学者用对一时一地有效的发现去说明非常不同的地点和时间的现象。

四、结 论

分析性叙述研究方法与一种认为应当使事件的结果要么极端系统化要么极端非系统化的历史观存在尖锐对立。分析性叙述的观点是: 理解事件发生的制度背景有助于解释某种事件是如何以及为何可能发生。这是意识形态的立场而不是方法论的立场, 因为博弈论本质上没有别的, 就是排除结果的完全不确定性。

使用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方法的其他学者也要求得到分析性叙述的标签。例如, 在近来的一篇文章中, 埃拉·凯茨纳尔逊 (Katznelson, 1997) 频繁使用这一名词来描述一个非常不同的方法论劝告, 它使用源自巴灵顿·穆尔 (Moore, 1966) 的方法来处理大规模宏观历史问题。我们并不是否认凯茨纳尔逊和许多他所引用的作者在将行为者、制度和结构这些复杂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理论化的意义上是分析性的。在他们强调背景、过程、序列和偶然性上, 他们是叙述者也没问题。泰达·斯考克鲍尔和玛格丽特·萨莫斯 (Skocpol and Somers, 1980) 称他们所偏爱的比较方法为“宏观分析比较史”, 在他们的研究中当然可以既依赖于叙述又依赖于重述。

正如凯瑟琳·泰伦 (Thelen, 1999) 所作的足够清楚的分析, 历史制度

主义者与新经济制度主义者之间的对比不应当被过分强调。两者都详细描述了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制度建立和破坏的过程。两者都一方面既认识到集体行动难题，另一方面又认识到路径依赖的角色。历史在起作用，制度约束和激励着行为，同时也对个人以及他们的偏好产生格式化的影响。虽然理性选择的实践者明确宣扬简化解释 (parsimonious explanations)，但是分析性叙述研究者对结构和细节感兴趣，正如历史制度主义者对减少变量数目和在大量历史与案例研究材料中进行选择的识别标准感兴趣。

即使如此，区别还是存在的。分析性叙述者可能越来越热衷于宏观比较研究者的比较方法，但是内在的紧张仍然存在，远未解决 (Munck, 2001; Mahoney and Rueschemeyer, 2002, 第 88—91 页)。即使存在于采取不同研究进路的特定学者间的界限消除了，它们的中值距离仍然相当远。这样的情况可能最初出现在研究风格上。例如，依赖于正规理论而非口头理论 (verbal theory) 就不仅仅是一种关于用一种方法而不用另一种方法来组织信息的偏好的问题。分析性叙述研究方法反映了一种独特的理论概念、理论构建和理论评价。

参 考 文 献

- [1] Bates, R., "The International Coffee Organ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in Bates, R. et al., *Analytic Narrativ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194—230.
- [2] Bates, R. et al., *Analytic Narrativ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 [3] Bates, R., "Analytic Narratives Revisited", *Social Science History*, 2000(a), 24(4), 685—696.
- [4] Bates, R., "The Analytic Narrative Projec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0(b), 94(3), 696—702.
- [5] Carpenter, D., "What is the Marginal Value of Analytic Narratives?" *Social Science History*, 2000, 24(4), 653—668.
- [6] Elster, J., "A Plea for Mechanisms", in Hedstrom, P., and R. Swedberg (eds.), *Social Mechanis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45—73.
- [7] Elster, J., *Alchemistries of the Mind: Rationality and the Emo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8] Elster, J., "Rational Choice History: A Case of Excessive Amb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0, 94(3), 685—695.
- [9] George, A., "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The Method of Structured, Focused Comparison", in Lawrence, P. (ed.), *Diplomacy: New Approaches in History, Theory, and Policy*. New York: Free Press, 1989, 43—68.
- [10] George, A., and A. Bennett, *Case Study and Theory Development*.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forthcoming.

- [11] Golden, M. , *Heroic Defeats: The Politics of Job Lo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12] Greif, A. , “On the Study of Organizations and Evolving Organizational Forms through History: Reflections from the Late Medieval Family Firm”,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1996, 5(2), 473—502.
- [13] Greif, A. , “Self-Enforcing Political Systems and Economic Growth: Late Medieval Genoa”, in Bates, R. *et al.* , *Analytic Narrativ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23—63.
- [14] Hardin, R. , *Liberalism,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5] Hechter, M. , “On the Inadequacy of Game Theory for the Solution of Real-World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s”, in Cook, K. , and M. Levi (eds.) , *The Limits of Ration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240—249.
- [16] Hechter, M. , “The Insufficiency of Game Theory for the Resolution of Real-World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s”, *Rationality & Society*, 1992, 4(1), 33—40.
- [17] Iversen, T. , *Contested Economic Instit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8] Katznelson, I. , “Structure and Configur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Lichbach, M. , and A. Zuckerman (eds.) ,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19] King, G. , R. Keohane, and S. Verba,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20] Kiser, E. ,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in Early Modern Tax Systems: A Principal-Agent Analysis”, *Politics & Society*, 1994, 22(3), 285—316.
- [21] Kiser, E. , and M. Hechter, “The Role of General Theory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1, 97(1), 1—30.
- [22] Kiser, E. , and M. Hechter, “The Debate on Historical Sociology: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d Its Critic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8, 104(3), 785—816.
- [23] Knight, J. ,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Confli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24] Laitin, D. , *Identity in Formation: The Russian-speaking Populations in the Near Abroad*. Ithaca, NJ: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 [25] Levi, M. , *Of Rule and Revenu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 [26] Levi, M. , “A Logic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ook, K. , and M. Levi (ed.) , *The Limits of Ration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402—418.
- [27] Levi, M. , “The Price of Citizenship: Conscription in France, the United States, and Prussi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Bates, R. *et al.* , *Analytic Narrativ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 [28] Mahoney, J. , “Nominal, Ordinal, and Narrative Appraisal in Macrocausal Analysi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9, 104(4), 1154—1196.

- [29] Mahoney, J. , “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d the Comparative Method: An Emerging Synthesi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0, 35(1), 83—94.
- [30] Mahoney, J. , and D. Rueschemeyer, *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31] Moore, B. ,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 [32] Munck, G. , “Game Theory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New Perspectives and Old Concerns”, *World Politics*, 2001, 53(2), 173—204.
- [33] North, D. ,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81.
- [34] North, D. ,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35] North, D. ,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in Alston, L. , T. Eggertsson, and D. North (eds.), *Empirical Studies in Institutional 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342—355.
- [36] North, D. , and B. Weingast, “Constitutions and Commitment: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Governing Public Choic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89, 49 (4), 803—832.
- [37] Peterson, R. , “Mechanisms and Structures in Comparisons”, in Bowen, J. , and R. Petersen (eds.), *Critical Comparisons in Politics and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61—75.
- [38] Petersen, R. , *Resistance and Rebellion: Lessons from East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39] Pierson, P. , “Path Dependency, Increasing Returns,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0, 94(2), 251—267.
- [40] Riker, W. , *Federalism*. Boston: Little, Brown, 1964
- [41] Rosenthal, J.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bsolutism Reconsidered”, in Bates, R. *et al.* , *Analytic Narrativ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64—108.
- [42] Scharpf, F. , *Crisis and Choice in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 [43] Scharpf, F. , *Games Real Actors Play*. New York: Westview Press, 1997.
- [44] Skocpol, T. , and M. Somers, “The Uses of Comparative History in Macrosociological Inquir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1980, 22(2), 174—197.
- [45] Stinchcombe, A. , “The Conditions of Fruitfulness of Theorizing about Mechanisms in Social Scienc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991, 21(3), 367—388.
- [46] Thelen, K. ,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9, 2(2), 369—404.
- [47] Van Evera, S. , *Guide to Methods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 [48] Weingast, B., “The Economic Rol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95, 11(1), 1—31.
- [49] Weingast, B.,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Civil War: Institutions, Commitment, and American Democracy”, in Bates, R. *et al.*, *Analytic Narrativ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148—193.
- [50] Weingast, B., G. Montinolo, and Y. Qian,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1995, 48(1), 50—81.

Modeling Complex Historical Processes with Analytic Narratives

MARGARET LEVI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TAO CHEN

(*Shen Ya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Abstract Both research with case and building model are common research ways in social science. They look very different but in deep relation with each other. Unless they integrate together, there isn't a progress of social science. This paper argues the approach systematically, such as content, essence and theoretic shelf, and so on. It also argues that analytic narrative go beyond the old rational choice method and research the special institution in special historic context with game theory. So social science can explain rebellion and revolution, state transforming and other important historical processes better.

Key Words Analytic Narrative, Strategy in Equilibrium, Path Dependence

JEL Classification A12, B15, C72